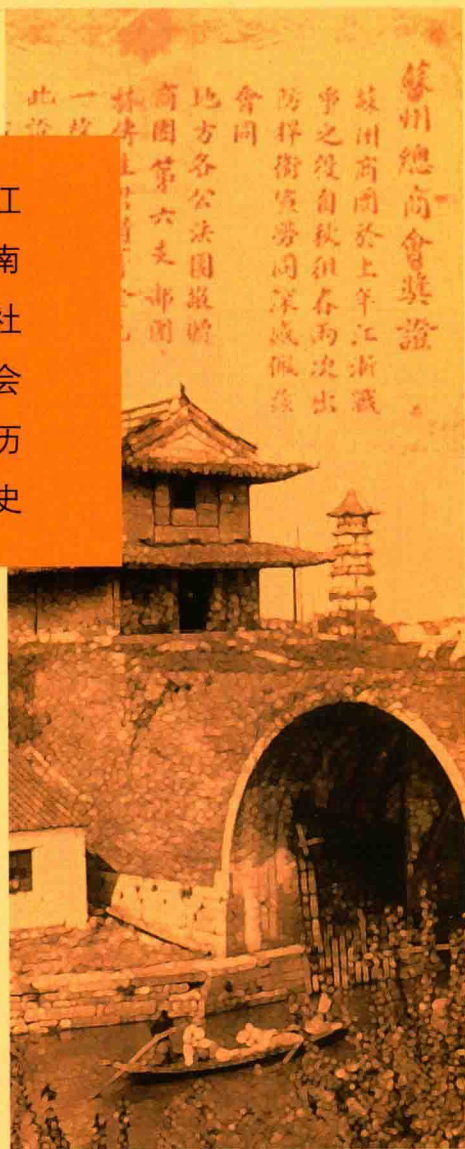


民国苏州商会研究

(1927—1936年)

王仲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南社会历史
研究丛书

唐力行主编

民国苏州商会研究

(1927—1936年)

王仲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南社会历史
研究丛书

唐力行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苏州商会研究.1927~1936年/王仲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12827-9

I. ①民… II. ①王… III. ①商会-研究-苏州市-1927~1936 IV. ①F7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9099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 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

民国苏州商会研究(1927—1936 年)

王 仲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3.5 插页 4 字数 523,000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827-9/K·2323

定价 58.00 元

总序

唐力行

近三十年来，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学术前沿，人们希望通过对各个区域社会历史的深入剖析而获得对中国整体史的新认知。在众多的区域中，江南社会历史尤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青睐。关于江南的区域范围，学界虽无统一看法，但大致可包括今日之苏南、浙北、上海与皖南，其核心则为苏、松、常、嘉、湖、杭、徽地区。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区域内有六朝古都金陵、南宋古都临安、明清都会苏州以及今天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近代以降，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汇，开始了中国区域社会最早的近代转型。今天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以传统的江南区域为核心发展而来的。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江南社会的学术潮流兴起于20世纪前半期，百年来学者对江南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所涉及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和徽商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在此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三十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学者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是将目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鸿篇高论，不胜枚举，可谓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令人目不暇接，研究

水平之高是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望其项背的。

我们研究历史离不开对当下的关心。中国近代化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缠绕纠葛中进行的，历史学界对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特色。江南社会历史还有着诸多的问题等着我们去探幽索微。江南研究也引起海外汉学家的关注。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城市中缺乏理性的经济团体和自治的公民社会。这一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到了清代，中国经济的成长已经跌入了“陷阱”，没有外力的推动，难以自拔。黄宗智有关江南农村内卷化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指出 1800 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他比较了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认为江南经济似乎略有优势，只是在 19 世纪两地发展才出现了大分流。这些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提醒我们，江南研究，不仅需要运用大量丰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理论框架和范畴。只有掌握了理论话语的主导权，才能使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学术水准。我们希望通过构筑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平台，包括出版“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杂志，以及每年主办一次江南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推动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以江南社会史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已形成以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长时段与短时段研究相结合、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注意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创新的研究特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我们与海外学者合作编纂了《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资料集，在勉力于江南研究基础工程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出版了《苏州与徽州——16 至 20 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江南儒商与江南

社会》、《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近代上海黑社会》等研究论著，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近年来我们在学科建设上也有所发展，建置了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并先后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2008 年被列为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市重点学科（编号 S30404）与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编号 SJ0703）为我们出版“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衷心希望丛书能为海内外江南研究的学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资深学者和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提供一片圣洁的学术园地，共同为繁荣江南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序

唐力行

王仲是我在苏州大学时招收的博士生（1999—2002年），朴实沉毅，有着良好的学术基础，他曾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受过历史文献学的严格训练，毕业后又在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室工作多年，在学术上已有相当的积累。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在苏州商会的研究上做出成绩来。以苏州商会为王仲博士论文选题，一则是为完成我的未了之愿。我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中曾对商会做过研究，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未遑深入开展苏州商会的研究。商人阶层是16世纪以后最为先进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的经营活动松动着传统社会的根基，推动着传统社会的缓慢转型。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下，商人始终处于两难境地，至今难以走出近世社会的怪圈。20世纪初兴起的商会组织是近代各类民间组织中实力最强者，然而始终难以挣脱两难境地。我希望王仲通过对苏州商会个案的解剖，推进对近代中国国情以及民间社会的认识。二则是苏州档案馆存有大量的苏州商会的资料，为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商会及其下属的同业公会会议文档，包括与政府机关的公文往来，体量之大，前所未见。但由于民国军阀混战及日本侵华战争兵燹，特别是文革期间的“破四旧”行动，许多城市的商会档案被毁坏，只有苏州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商会档案幸运地得以完整堆放保存。由于晚清苏州商会档案所记述和反映的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丰富多彩的工商业活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所以它与八大商会中的天津商会档案分别代表了我国南北两

个不同类型城市的商会特色，弥足珍贵。三则开展对江南社会的研究，是我研究生培养的既定计划。王仲的课题也是其中之一。

王仲当初确定以民国时期苏州商会为论文选题时，苏州商会档案已出版了第一辑（从1905年苏州商务总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结束）。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是由华中师范大学与苏州档案馆合作进行的。我的堂兄华中师大唐文权教授也参与其事，他告诉我：原先苏州档案馆内部对库房内的档案按时间顺序分类整理，装订成册，然后再进行编码，供使用者引用。华中师大的整理工作，则是预先设置类别，然后选择有代表性文档，以档案篇目为标题编纂。但出版的档案远未网罗所有档案内容，所漏选的不乏有重要历史信息的文档篇章。华中师大是王仲的母校，他做苏州商会也是一种缘分。当时已有一些学者据第一辑资料，开始做清季苏州商务总会的研究。王仲并没有选择这条捷径，而是把课题的时段定在1927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我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曾指出：1927年“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权建立后，自然不能容忍在工商界享有较高声望的上海总商会像以往那样不受政府的约束和节制，任意干预政治，甚至作出抗命行为或染指政权等与国民党中央不保持一致的行为。他们全然不顾上海总商会所代表的上海各业资本家在国民党政权建立前后竭尽全力的经济支持及附和反共、效忠‘党国’的行为，罗织种种罪名陷上海总商会于‘非法’。”传统时代，统一有利于商业流通，但统一的专制政权却必定抑商。商人的两难境地在这—时段有着更清晰的演绎。我十分支持王仲的选择，并要求他把商会这个“戴着镣铐的舞者”写活写透。为了研究的需要，王仲深入苏州档案馆内，胼手胝足，抄写档案，深入思考，历经三个寒暑，终于完成了这篇优秀的毕业论文。

王仲的研究具有下述两个优点：一是处理好商会的共性与苏州商会的个性的关系。自晚清政府倡导成立商会后，全国商会在组织结构和所承受的政策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商会的活动基本上也是一哄而起的集体行动。苏州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工商名城，因为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更多的时候是跟随京、沪等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商会和全国商联会后面行动。虽如此，但并不是说苏州商会并无特色，而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苏州商会因无需动员全国商会的行动，因而更容易发展自己的网络。如，苏州商会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对农业的扶持都是其向下拓展活动空间的活动。二是史论的有机结合。王仲对苏州商会组织结构，纵向、横向网络关系都作了详细的分析。苏州商会的一切活动也就是建立在这种网络基础之上的。苏州商会对城市社会治理的活动，尤其对参与市政建设和乡村治安的维护都是尽力而为。作者在处理史实和史论的关系时，时时不忘把苏州商会置于国民政府的强势控制的背景下考察，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会的许多问题就得到合理解释。王仲所探讨的以商会为代表的基层社会组织规则与社会网络，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地区风俗习惯与大众心态，同时也引起国家权力注视。民间组织是制衡国家权力的重要力量，国民党本身也是由民间组织发展而成为执政党，受当时社会潮流的影响，国民党在动员社会各阶层革命之时，比较重视中小商人的力量，支持其组建商民协会，商民协会自恃有国民党的支持，竟欲取代商会。由此形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人组织内部的纷争，纷争是其表象，背后可见国家权力的影子。执政后的国民党对社会组织则采取了控制措施，国民政府藉实现“宪政”的需要，推出很多法规，民间组织调解社会纠纷的权力率先丧失。以苏州商会来说，这一时期劳资冲突中本来商会调解纠纷的应有之职责也被劳资双方置之不理，商会领导人成为劳方发泄愤怒的施暴对象。这一切前所未有的现象，都可从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的博弈中得到解释。作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期间所出现的历史现象再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的视角加以解释。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王仲来到华东理工大学工作，他根据理工大学的特点，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由近代商会史研究下延到当前民间组织的研究，重点关注当代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乃至全球治理问题。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呈三足鼎立之势，社会组织被称为第三部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第三部门”并不发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中国也

需要“第三部门”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理性选择民间组织参与中国社会治理的路径是社会学者不断探讨的议题。当今世界，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各国非政府组织不仅致力于国内治理，还参与国际问题的议题。王仲根据条件，不仅关注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国内市场的管理，还在探讨民间组织在两岸关系中的协调作用。在这方面已取得一定成就，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的这些后期研究，得益于前期商会的研究。经过长达十年有余的积累，当我将苏州商会研究纳入《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时，他的后期研究，也对前期商会研究的深度与厚度产生影响。

王仲是一个认真的人，近年来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对博士论文作了精心的修改。在他着手修改之前的2009年，华中师大历史所与苏州档案馆一气推出《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的第三、四、五、六辑。《丛编》的第四辑正是本书的研究时段。按理说，作者完全可以依赖第四辑上下两册的史料修改本书，但作者在参考已出版资料的基础上，仍利用暑假时间去苏州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2005年苏州商会档案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的档案原件被扫描输入电脑中，原来的纸质档案一般不轻易示人，读者只得对着电脑抄写。王仲整整一个暑假都从电脑中抄写档案。与此同时，他还在苏州档案馆中抄写同一时期的《吴县日报》、《苏州明报》等各类报纸，用报纸资料与档案资料相互佐证，工作之艰辛，可以想见。使得本书具备了更为扎实的史料基础。

读后掩卷，思绪万千。1998年我与王国平教授共同主编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出版，在这本碑刻集中就收有苏州商会的碑刻。我们在序言中写道：“清季，中西文化交汇，苏州得风气之先，苏人心态更有一大变迁。商人以新的姿态出现，《清封资政大夫分部员外郎候选州同杭君墓志铭》告诉我们，这位‘弃儒术习贾’，‘席世资，益恢厥绪’的纱缎商人，后来成了苏州国货维持会的支部长、省总商会的议董。他‘请愿国会，诣阙政府，勇言得失’，‘任（民团）中路团长，寒夜风雪策骑周巡’，以积极进取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100号碑）商品经济所引

起的社会变迁，改变着苏州人的心态，苏州人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投入近代化的事业”。期待着挣脱两难境地的商人，“策骑周巡”，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是为序。

2014年11月25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商会史研究学术系年 ...2
- 第二节 商会其他问题拾遗 ...17
- 第三节 关于史料的运用与研究方法 ...21

第二章

清末民初苏州商会的创建与活动

- 第一节 清末“新政”后苏州商会的建立与发展 ...24
- 第二节 早期苏州商会的“抵货”与“革命” ...33
- 第三节 民国初年苏州商会的主要活动 ...42

第三章

“训政”时期苏州商会组织系统的变迁

- 第一节 清末“议董制”下的商会组织 ...54
- 第二节 民国初年苏州商会组织的演变 ...57

第三节	“训政”时期苏州商会的改组	...62
-----	---------------	-------

第四章

苏州商会与各地商会的网络关系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通讯技术与商会网络的扩展	...103
第二节	商会的纵向网络与系统运作	...119
第三节	商会网络与利益表达	...125
第四节	商会网络与民族利权及赈灾的集体行动	...154

第五章

苏州商会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第一节	商会与苏州乡村社会组织的互动	...169
第二节	商会协助政府维护乡村社会治安	...180
第三节	商会对农业的扶持	...184

第六章

苏州商会与地方社会治理

第一节	商会参与市政建设	...198
第二节	商会与安全卫教事业	...208
第三节	商会的慈善公益活动	...217

第七章

强势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控制

第一节	“训政”初期国家对商会的强力控制	...227
-----	------------------	--------

第二节	国民党对商会的组织控制	...246
-----	-------------	--------

第八章

商会对国家强势控制的反控制

第一节	商会自身结构的优化	...264
第二节	商会与官府行工程式之争	...272
第三节	商会在经济领域内的利权争取	...278
第四节	商会政治表达权的争取与顿挫	...289

第九章

商会权力空间的逐渐丧失

第一节	商会原初功能的萎缩——以商事裁判权为例	...301
第二节	绅商的回归	...317

结 语 ...329

参考文献 ...332

附 录：1927—1937 年苏州商会大事记 ...347

后 记 ...358

第一章

绪 论

苏州商会是国内商会史研究的发端之一。近代国内著名的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南京、苏州等八大城市商会中仅苏州、天津两地商会档案被完整保存下来，分别代表了南北两个不同类型的商会情况。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经马敏、朱英的筚路蓝缕开拓，苏州商会连同整个商会史的研究在海内外迅速展开，到 90 年代末进一步繁荣并蔚为“显学”。关于苏州商会，其成立后的晚清时段马敏、朱英已有开拓性著作《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作了深入的研究，该书也是商会及民间组织研究领域征引率很高的专著。民国以后，苏州商会因其档案未被整理出版，以致学界的注意力多转向天津商会，苏州商会研究一度沉寂，只有苏州商团仍被朱英发掘加以研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苏州商会仍然一如既往地活跃于国内和地方社会。然而，此时国内政治、经济急剧变迁，国家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国内有了完整的政治、经济法规，确定了中国历史党治政体，取代了传统的帝制形式，这些政治、经济的因素对苏州商会乃至全国商会都有影响，因此，本书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十年的苏州商会为研究对象，其旨趣是要延续晚清苏州商会研究，同时也力求作为考察国民党训政时期商会发展状况的资证。

民国苏州商会研究（1927—1936年）

第一节 商会史研究学术系年

一、商会史研究的发展与范式

（一）商会研究的起步

真正针对商会组织本身的研究开始于商会档案的整理。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家章开沅出于研究江浙资产阶级的需要，来到苏州档案馆收集资料，发现了大量封存完好的苏州商会档案。在章开沅、胡光明等早期商会史研究专家的呼吁下，北京、上海、天津、苏州等地档案馆都计划整理本地商会档案，编成大型资料丛书。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开始与苏州档案馆共同整理研究苏州商会档案，并于1991年9月出版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同年，天津市档案馆和天津社会科学院亦把整理天津商会档案全宗列为重点项目，完成了晚清天津商会档案的整理工作，出版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到90年代，这一浩大工程有了初步的结果，由胡光明、蓝长云主编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全部出版发行，共5辑、10册，跨度从1903年延续到1950年，总共1000万字，在同类资料中实属罕见。

与此同时，由华中师大与苏州档案馆也开始了后续的商会档案整理工作，继1991年出版的第一辑之后，21世纪又推出了二、三、四、五、六辑，从时序上看，第一辑从1905年到1911年；第二辑从1912年到1919年；第三辑从1920年到1927年；第四辑从1928年到1937年；第五辑从1938年到1945年；第六辑从1946年到1956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则与上海市工商联史料室整理编辑《上海总商会史料丛编》。关于北京商会有虞和平推出选编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史料计划。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为商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和《天津商会档案》的相继出版，打开

了商会史研究的方便之门。大量有关中国商会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论著相继问世，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中外学者所瞩目。而且档案整理本身就是一项研究的工作，把档案按商会活动类别进行分类，通常分为组织沿革、发展实业、商事纠纷和民事纠纷、社会公共事业、政治参与、捐税征收，等等，这项分类就包含了整理的过程，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早期商会研究多是实证研究，研究者对商会的组织结构、商会的性质及与国家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讨论。较早对商会的组织结构进行研究的是马敏。马敏在《清末苏州商会组织系统试论》一文中，对苏州商会组织系统作了剖析，他不局限于商会自身的组织结构，而把商会置于一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他认为苏州商会组织不只是若干彼此孤悬的实体——商务总会、分会或分所，而是既包括实体也包括关系的作为有机整体存在的组织系统。苏州商务总会与分会、分所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沿官方规定和实际调整合力而形成的特殊组织控制系统；相对于总会而言，分会是一被控系统；而相对于分所，分会又成了控制系统。在苏商总会组织体系中，还存在非本体系统范畴的苏商体育会及市民公社。商会不是一个商人组织实体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系统。^①其后，朱英对民初苏州商会的组织结构发展演变作了考察。着重考察辛亥革命后的政体变更对商会组织结构的影响，这其中原因乃在于商会与时俱进地采取新的应对举措和发展措施，表现在商会不断完善自身的选举制度，使商会的选举与以往相比更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其次，苏州商会成立了商事公断处等新的机构，在受理商事纠纷方面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②

研究商会组织系统还涉及商会产生之前的一些商人组织及其与商会的关系。商会是传统商人组织——行会、会馆、公所整合而来。行会、会馆、公所都是商人自发形成的组织，均属于商人社团。一般而言，会馆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人团体，带有浓厚的地域乡土色彩。公所最初

① 马敏：《清末商会组织系统试论》，《江海学刊》1988年第3期。

② 朱英：《民初苏州商会的发展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